

康熙朝的“理治”思想

——以《圣谕十六条》为例

张婷婷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 明末清初, 正值朝代更迭, 社会动荡, 学术思变之时, 日益加剧的满汉矛盾, 直接引发了满清王朝社会、政治、经济、思想上的一系列问题。这些不可避免的问题使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而解决这些危机, 以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思想便自然应运而生。纵观整个康熙朝, 不仅在学术上推崇程朱理学, 还在政治上形成了以理学治国的思想。本文以清王朝于民间宣讲了二百多年的《圣谕十六条》为例, 初步探究康熙朝的“理治”思想。

关键词: 康熙、理学、理治思想、《圣谕十六条》

中图分类号: K249.2

文献标识码: A

中原王朝更国改姓本是寻常之事, 但满清以一隅小族, 逞弓马勇武之势, 整族入关乃至取代明朝, 遂统天下, 这于亡国的汉民便是“天崩地裂”“礼崩乐坏”的大难。所以明清之际, 正是朝代更迭, 社会动荡, 学术思变之时, 汉民不免对满清心存夷夏之防, 满清统治者对汉民亦有统治之忧。逮至康熙朝,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思想上的种种统治之忧日益加深, 如何巩固清朝的统治, 荡除“诸政之弊”, 以达到康熙帝期望的“敦庞之治”就成了满清统治者首要考虑的大事。对此, 深受理学影响的康熙帝与他的理学名臣构建了一套以理学治国的为政思想, 并将其化为政策、上谕等推行全国。其中, 颁布于康熙九年的《圣谕十六条》便是体现了这种以仁德化民、礼法治政的“理治”思想。

一、“理治”思想的产生背景

1、诸政之弊

“天地裂变”之后, 汉民对满清既有亡国之恨, 又有剃发易服之辱, 再加之满清统一天下的过程中, 不乏大量汉民流血等事, 而满清贵族又对汉民不屑一顾, 屡用高压手段, 长此以往, 致使满汉两族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汉民不服满清的统治, 屡有起义反抗, 更在民间结成许多反清党会, 意图恢复汉人统治, 仅康熙年间, 就发生了十起以明朝“朱三太子”为号的起义。

且由于满清国朝初定, 边疆未服, 如朝鲜、安南、缅甸、暹罗在清王朝与南明较量时, 在二者之间摇摆不定。满清统治阶级内部亦矛盾重重, 旧有的议政王大臣会议, 对皇权形成制约, 享受既得利益的满洲权贵, 事事主张“率祖制, 复旧章”¹, 与崇汉化的顺治、康熙二帝多有权力摩擦。而在中原内部, 在顺治十八年(1661)灭掉南明之后, 仍有郑氏割据台湾。云南、广东、福建三地, 又分别握在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三藩手里。三藩享有极大的独立性, 如猛虎毒蛟卧于清廷身侧。北疆的蒙古诸部, 本就互相征伐

1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二百四十九, 第32册, 9675页,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不断，与清廷更是甚难一心。东北交壤的沙俄，屡次于黑龙江、松花江流域抢掠、杀戮百姓。

所以明末清初时，连年兵灾不断。这些人祸，夹着不绝的天灾，就引发了清初经济、人口的难关。在中原地区，已然“满目榛芜，人丁稀少，几二十年矣”²“大兵所至，田舍一空。”³更有甚者，有些地区竟达到了“民无遗类，地尽抛荒”的惨境。

而在风俗、人心方面，清初尚存晚明时的不正风气，在顺治三年（1646），顺治帝殿试时，制策为“每闻前代朝臣，分门别户，植党营私，蒙蔽把持，招权纳贿。朋类，则顿生羽翼。异己，则立坠深渊。更有同年、同资、师生、亲故、互相援助，排挤孤踪。浮议乱真，冤诬莫控，朝纲大坏，国祚遂倾，深可鉴戒。今恐在朝各官，因仍敝习不能力改前非。所关治乱，甚非细故，必如何而后可尽革其弊，俾朕得日闻正言、行正事，以综核名实、修明法纪。在外各官，贪酷不公者甚众。临民听讼，惟贿是图善恶不分曲直颠倒。吏治既坏，民心日离，奸狡计行，善良被陷，斯亦向来有司之痼疾也。必如何而后再能使官方清肃风俗还淳，以致太平。欲定天下之大业，必一天下之人心。吏谨而民朴，满洲之治也。”⁴可见，这种不正的社会风气，早已引发满清统治者的忧虑。

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连康熙帝也感慨道“各省民多失所，疾苦颠连，深可悯念。或系官吏贪酷，朘削穷黎，抑或法制未便，致民失业。”⁵

康熙六年（1667），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上疏直陈朝廷弊政，“政事纷更而法制未定”，“职业堕废而士气日靡”，“学校废弛而文教日衰”，“风俗僭侈而礼制日废”。⁶一疏正与康熙帝的忧虑不谋而合。为了解决诸政之弊，熊赐履谏言“盖立政必本于修身，修身莫先于明理，体用一原，微显无间，圣经贤传，著有明微，自古迄今，未有之议。”⁷遂“理治”思想产生绝非偶然。

2、清因明制

崇儒重道，以至于推崇程朱理学，非是康熙帝一人独有的想法。早在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满清便推行汉化，不只在官制、体制的方面，沿袭明代成法，在思想文化上更是因袭明制。

谢国桢在研究明清史时，对于清因明制一事上论言道“‘清因明制’的思想根源，我们可以上溯到清太祖努尔哈赤开国之初。努尔哈赤曾受明朝龙虎将军的封号，并三次到过北京，熟悉关内的风俗情况。当他统一了东北各民族，建立起后金国家之后，用蒙古字头编制了老满文；到清太宗天聪三年，命达海榜式改进为加圈点有区别的新满文；同时还翻译了不少汉族文化传统的书籍，如翻译明太祖朱元璋所颁布的《大诰三编》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又翻译了《三国演义》，作为出谋划策，用兵作战的参考。这些书籍的翻译，说明了清初统治者借助明朝的风俗习惯和典章制度作为统治的工具，同时也为康熙‘清因明制’思想

2 李人龙：《垦荒宜宽民力疏》，《皇清奏议》卷四，续修四库全书本。

3 肖震：《请正人心以维世道疏》，《皇清奏议》卷十五，续修四库全书本。

4 邓洪波、龚抗云：《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清顺治三年丙戌科》，1324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5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十二，《清实录》第4册，30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6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十二，《清实录》第4册，308-30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7 熊赐履：《请除积习销隐忧疏》，《经义斋集》卷一，康熙二十九年经义斋课本。

的出现奠定了基础。”⁸

满清入关以后，这种汉化趋势、笼络汉人的力度比之前更强。顺治十年（1653）上谕道“国家崇儒重道，各地方设立学宫，令士子读书，各治一经，选为生员，岁试、科试入学肄业，朝廷复其身，有司接以礼，培养教化，贡明经，举孝廉，成进士，何其重也。”⁹这种兴教化的举措，就连顺治帝本人也寄托了美好的政治理想，他说“自明季扰乱，日寻干戈，学问之道，阙焉未讲。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¹⁰，更于顺治十四年（1657）下谕举行经筵，“经筵大典，理当早举。向因文华殿未建，有旨暂缓。今思稽古典学，有关治道，难以再迟，应于保和殿先行开讲。尔部即详考典例，择吉开列仪注具奏。”¹¹

在此背景下，康熙帝自幼学习汉文化，不但继承了其父顺治帝“满汉共进”的思想，还对理学格外推崇。他在面对清初内忧外患的统治危机时，言“朕孜孜向学，无非欲讲明义理，以资治道，务其躬行实践，非徒为口耳之资。”¹²这种深厚的儒学基础，为康熙朝的“理治”思想铺垫了道路。

二、“理治”思想的内容

顺治九年（1652），顺治帝将明太祖朱元璋教化百姓的六谕文钦定为“圣谕六言”，康熙亲政后，又将“圣谕六言”进一步丰富阐述，于康熙九年（1670）颁发了《圣谕十六条》，并令各地宣讲，朝廷百官更要督率实行。康熙帝认为“惟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会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缓刑，化民成俗。”¹³

《圣谕十六条》的内容为“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¹⁴此十六条充分反映了“理治”思想的内容，涉及了道德、教化、法制、学术、礼俗、农事等国治的各个方面，以达到“尚德缓刑，化民成俗”、“移孝作忠”、“华夷并进”的目的。

其中，可以依照《圣谕十六条》将“理治”思想大致分为两点，其一是以仁德化民，即厚风俗、正人心。具体为“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明礼让以厚风俗；息诬告以全良善；解仇忿以重身命。”八条，其二是以礼法治政，即崇正黜异、端本清源。具体为“重农桑以足衣食；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八条。

8 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78-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9 《世祖章皇帝》卷七十四，《清实录》第3册，5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 《世祖章皇帝》卷九十一，《清实录》第3册，7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 《世祖章皇帝》卷一百一十一，《清实录》第3册，8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12 碑传集卷一一熊赐履事状，转引自高翔：《康雍乾三帝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三十四，《清实录》第4册，4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14 同上。

1、以仁德化民——厚风俗、正人心

康熙帝对教化分外重视，他直言道：“朕维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¹⁵他的这种思想，还展现在朝廷取士上。康熙十五年(1676)三月，殿试制策题曰“且忠孝者，人生之大节也。知之明，则不惑于邪正，守之固，则不昧于顺逆。乃人心不古，奸宄潜滋，所关世道，良非细故。岂亲亲长长之谊素未讲究欤？抑司教者之训饬未备也。”¹⁶命参与殿试的举子，依此制策。康熙帝在策题中，毫不避讳的指出，人生大节就是忠与孝，每个人都既要知明，更要守固，才能不惑邪正，不昧顺逆，这样，若人人如此，则社会便会人心尚古，奸宄消弭。康熙帝还认为“其要在仁义而已矣……仁以育之，义以正之。仁以育之，所以养也；义以正之，所以教也”“兴礼教以正民德”¹⁷“致治以服人心为本，人心服更无余事矣”“力行教化，冀以感发天良，偕之荡平正直之道。”¹⁸

而如何厚风俗，正人心？在《圣谕十六条》中，“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明礼让以厚风俗；息诬告以全良善；解仇忿以重身命。”八条中，首先即明孝悌之道。孝悌发于心，基于血缘，是人生来便有的社会关系，而除父母兄弟外，再广之即宗族，再广即乡党。这些每个人都不可逃避的社会关系，如果一一孝、悌、笃、和，就能宗族和睦，乡间无争。一家一姓一乡如此，再推及全国，那社会的动荡不安，便会消弭于日渐端正的人心与风俗当中了。尚节俭，是底层百姓积累财富的方式，只有“衣食足”才会“知礼节”。而诬告、仇忿是人心浮躁，风气紊乱所引发的，所以要息、解来完善个人心性。至于隆学校一句，康熙帝早有论断“治天下者，莫亟于正人心，厚风俗，其道在尚教化以先之。学校者，教化所从出，将以纳民在于轨物者。”¹⁹

由此可见，康熙帝希望“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俗愈美于下，治自然愈隆于上。他说“朕惟自古帝王，承乾立极，绥理万邦，莫不以厚风俗、正人心为久安长治之本。其时，化理敦庞，民生朴茂，海内群黎，咸享丰亨豫大之休，洵府事修和之成效也。”²⁰“朕惟自古帝王，治定功成，尤加意乎人心风俗之所尚，以图万世治安之本。维时礼教明于上，仁让兴于下，俗重敦庞，人多谨恇，国计丰裕而比屋盈宁，四方清晏而川岳效顺。”这种以仁德化民的思想始终贯穿于整个康熙朝，以期达到“敦庞之治”。

2、以礼法治政——崇正黜异、端本清源

康熙帝亲制《刊刻日讲御制序》，开篇即言：“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自尧、舜、禹、汤、文、武之后，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书》、《诗》、《礼》、《春秋》而外，而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之书。如日月之光昭于天，岳渎之流峙于地，猗欤盛哉！盖有四子而后二帝三王之道传，有四子之书而后五经之道备，四子之书得五经之精意而为言者也。孔子以生民

15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八，《清实录》第6册，5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16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六十一，《清实录》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

17 《清圣祖御制文集》卷十八，第1集，清光绪五年印本。

18 《康熙起居注》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

19 《清圣祖御制文集》卷二十七，第1集，清光绪五年印本。

20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六十一，《清实录》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

未有之圣，与列国君、大夫及门弟子论政与学，天德王道之全、修己治人之要，俱在《论语》一书。《学》、《庸》皆孔子之传，而曾子、子思独得其宗。明新止至善，家国天下之所以齐治平也；性教中和，天地万物之所以位育，九经达道之所以行也。至于孟子，继往圣而开来学，辟邪说以正人心，性善仁义之旨著明于天下。此圣贤训词诏后，皆为万世生民而作也。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²¹他对道统的推崇与维护，也正是维护清王朝治统的正统性。他在《圣谕十六条》中，已明确指出“黜异端以崇正学”，正学即理学，并以政治高压政策，来确保“崇正黜异”的施行。如康熙五十三年（1714），发布上谕“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近见坊间多卖小说淫词，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士子未免游目而盻心焉。所关于风俗者非细，应即通行严禁。……凡坊肆市卖一应淫词小说，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督抚等转行所属官弁严禁，务搜板书，尽行销毁。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买看者杖一百。该管官弁不行查出者，交与该部按次数分别议处。仍不准借端出首讹诈。”²² 在确立正统、正学后，康熙帝又一治政思想，便是端本清源。

康熙十九年（1680），康熙帝谕诸臣道：“朝廷致治，惟在端本清源。臣子服官，首宜奉公杜弊。大臣为小臣之表率，京官为外吏之观型。大法则小廉，源清则流洁，此从来不易之理。如大臣果能精白乃心，恪尊法纪，勤修职业，公而忘私，小臣自有所顾畏，不敢妄行。”²³此即“讲法律以儆愚顽”之义。《圣谕十六条》甫颁发时，康熙帝便命朝内外百官督率实行，既要臣子们普民以法，又要他们作表率，以革除吏治之弊。

康熙二十一年（1682），又下谕：“朕每欲得良策澄清本源，使远近清平，永行遵守。近见光棍事案较前渐少，惟强盗一事常厯朕怀……此皆不得澄清本源之道，故致如此耳。”²⁴康熙认为，强盗等不法事，皆是本源不清导致的。想要澄清本源，就要“重农桑以足衣食；联保甲以弭盗贼。”

康熙二十三年（1684），谕刑部、都察院堂官及监察御史等：“近见处处穴地，将人隐藏私卖者甚多，此皆由不清本源，以致获罪人多，故哄骗之事不已。”²⁵又说“彼土之人惟好讦讼，尔至当敷布教化，俾识义理，令俱改过迁善。”而要禁止这些获罪、哄骗、攻讦等事，必使人“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

只有“崇尚教化而几致刑措”，“乐循礼而耻犯法”²⁶，天下才会大治。

三、“理治”思想的影响

《圣谕十六条》自颁发以来，就被满清统治者视为万民的行为准则，不只下令全国宣讲，还要求朝内外官吏督率实行，以达到移孝作忠、以仁德化民、以礼法治政的目的。显然，这种“理治”思想，有其成功的一面。在康熙时代出现了“覃敷文教，比户皆弦诵之声”，“久道化成，风移俗易”的景象，满清王朝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军事都取得了极大

21 康熙帝：《刊刻日讲〈四书解义〉御制序》，《康熙政要》卷十七，宣统年间铅印本。

22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八，《清实录》第6册，5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23 《康熙起居注》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

24 同上。

25 《康熙起居注》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

26 《清圣祖御制文集》卷一十七，第1集，清光绪五年印本。

改善。康熙帝的继任者雍正帝更在《圣谕十六条》的基础上，逐条阐述，辑成《圣谕广训》，并制定了严格的圣谕宣讲制度。他在《圣谕广训》中这样解释此十六条的重要，“一人倡之，众人从之；一家行之，一里效之。由近以及于远，由勉以至于安，渐仁摩义，俗厚风淳，庶不负谆谆告诫之意哉！”。

但显然这种“理治”思想有其弊端。自明朝亡国后，中国学术界进入了对自身学术的反思。其中黄宗羲、顾炎武、傅山等，都对程朱理学进行了反思与批判。

顾炎武道：“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²⁷直指理学空谈误国的不正风气。傅山亦言：“凡所称理学家，多不知诗文为何物，妄自谓我圣贤之徒，岂可无几首诗、几篇文章为后世师范？遂高兴如何物清意味，何物天下理而已矣。也有几篇行世，其为之弟子者又不知其先生父兄之诗文为何物，意以为吾师父兄之诗文岂有不佳者？尽气力为之表扬，不顾人禁受得与否，而惟恐其人之不闻不见也。”²⁸这种对宋明理学流弊的批判，对自身学术的反思，不禁引发了明末清初的寻求思想解放的启蒙思潮。

然而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理治”，将崇正黜异作为清王朝维护官方思想的准则，清廷一味儿的推崇、抬高理学，排斥、打击其它学术思想，这样就使得中国至今尚未完成一种适应当今社会的中国学术的构建，当引为吾辈之大憾。

参考文献

- [1] 赵尔巽等：《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 李人龙：《垦荒宜宽民力疏》，续修四库全书本。
- [3] 肖震：《请正人心以维世道疏》，续修四库全书本。
- [4] 邓洪波、龚抗云：《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 [5] 《圣祖仁皇帝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
- [6] 熊赐履：《请除积习销隐忧疏》，康熙二十九年经义斋课本。
- [7] 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8] 《世祖章皇帝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
- [9] 《康熙起居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0] 《清圣祖御制文集》，清光绪五年印本。
- [11] 《康熙政要》，宣统年间铅印本。
- [12] 傅山：《傅山手稿一束》，北京，三联书店，1983。

27 顾炎武：《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日知录集释》上册，卷七，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8 傅山：《傅山手稿一束》，《中国哲学》第10辑，北京，三联书店，1983。

Kangxi's Thought of "Rule" -- Take Article 16 of the Oracle for example

Zhang Tingting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2)

Abstract: At the turn of th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the ever-increasing contradictions between Manchu and Han coincided with a series of soci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ideological problems in the Manchu dynasty at a time when the dynasties were changing, social unrest and academic change were taking place. These inevitable problems put the rule of the Qing dynasty at risk. The solution to these crise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ideology of the rule of the Qing Dynasty naturally came into being. Throughout the Kangxi dynasty, not only academic Cheng Zhu Neo-Confucianism, but also politically formed a political science and philosophy. In this paper, the Qing Dynasty dynasty proclaimed the 16 ordinances of the Holy Scriptures more than 200 years as an example to probe into the "righteous governance" thought in Kangxi Dynasty.

Keywords: Kangxi, Neo-Confucianism, ruling philosophy, "Holy Chapter 16"